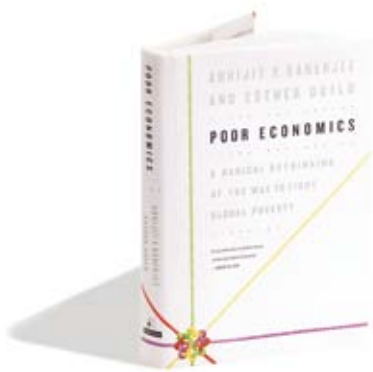


让事实说话



阿巴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
贫穷经济学

全球减贫方式的根本性再思考
公共事务，纽约，2011年，336
页，26.99美元（精装）。

近几年，发展经济学所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主要源于随机对照试验（RCT）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贫穷国家中的个体行为。随机对照试验的创始者和奠基人——阿巴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在综合了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贫穷经济学》这本书中对减贫的政策设计提出了新建议。这是一本非常有趣而重要的书。

随机对照试验，正如其名称所反映的，是研究个体和公司等各个群体，对影响其行为的特征加以控制后，在遭遇一系列新环境时的反应。例如，肯尼亚研究人员在提供蚊帐时分为部分补贴和免费等不同种类，从而确定使用蚊帐对价格影响的敏感程度（结果是，对价格影响非常敏感，而对使用者收入的影响不敏感）。

书中记录了公共卫生、教师出勤、家庭储蓄和借贷（尤其是小额信贷）、小型企业成立及发展、儿童入学以及其他行为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班纳吉和迪夫洛通常从介绍一个穷人行为（或其所遭遇的环境和问题）的奇闻轶事开始。然后根据其行为做出分析推断，并报

告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这些结果对穷人在不同激励机制下的反应加以说明，并总结出减贫最行之有效的政策结论。

这本书的分析框架提出了贫困中的突发事件是否是相对线性的问题：随着收入逐步提高，他们是否能继续改善自身的状况，还是他们正处于一个类似“贫困陷阱”的状态，必须需要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来帮助他们跨过这个门槛，才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慢慢进步？作者认为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结果更支持给他们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这一途径。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和行为推断所积累的论据支持，班纳吉和迪弗洛提出了许多政策解决方案。例如，对于卫生部门，他们得出结论认为“低价”的医疗技术正如“树上那些伸手可及的果子”，包括“给孩子注射预防疫苗、喂驱虫药、为孕妇注射破伤风预防针、为预防盲目提供维生素B、为预防贫血提供含铁药片以及含铁的面粉”。

这本书对医疗保健的总体建议很值得引用：“贫困国家医疗保健政策的首要目标应是让穷人获得预防性医疗保健的途径尽可能简单容易……应在水源旁免费配置加氯器；父母如果孩子注射了预防疫苗应该受到嘉奖，孩子们在学校应免费获得驱虫药和营养补充品，应对水和卫生设施进行公共投资”。

即使医疗卫生是他们唯一关注的问题，但作者希望解决的问题太多，不得不考虑成本问题。然而，班纳吉和迪弗洛对社会政策的其他方面也提供了政策解决方案。他们指出穷人面临高风险，而可供其选择的保险缺失，所以“这应是政府行为该发挥作用的环节。政府应为穷人购买保险进行补贴”。作者还建议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鼓励教师留在学校，通过银行监管来要求银行借款给“优先部门”，提高入学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尤其

是在贫困人口聚集的农村），并提供良好的工作机遇，以使他们从贫困陷阱中解脱出来，等等。

由于好的工作基本都在城市，所以作者不仅呼吁创造这样工作机遇（尽管不只限于要求银行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但是作者没有说明具体措施），同时对进入城市的移民给予补助。因为现在大多数城市的移民人数都多于好的工作数量，所以这一条宏观经济解决方案受到了质疑。

无疑，如果班纳吉和迪弗洛支持的项目中多数能够有效执行的话，都是非常值得的。但还存在两个大问题和几个小问题。首先，在一个稳定的财政/宏观经济框架下，所有那些政策都能执行吗？如果不能，通常就会出现相对回报率等问题，而书中没有对这些问题提出充分的解决方案。其次，因为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这个领域的其他组织无法确定日期，所以能将希望寄托于这些单位执行以上政策而免于失败吗（例如，大部分福利都流向富人，不能保证教师留在学校）？

本书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过渡期间政府如何为这些措施提供资金支持（更别提用收入提高后增加的税收来弥补这些成本了）。

班纳吉和迪弗洛令人信服地指出现存项目中存在许多浪费现象。但是技艺精湛的医生不可能一天成就，或者如果关闭现在的（无人问津的）医疗诊所也无法为作者所建议的这些措施释放出足够的资源，以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有些政策建议的问题更为突出：贫困国家的一大需求是金融体系更为有效。但是作者的观点似乎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更应信任中小企业（能创造就业）和小额贷款。但是即使那些建议初看非常切合实际，但是因为资源有限，要提供的每种公共产品的数量也会面临艰难的选择。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贯彻

执行这些政策。作者非常清楚在现在的那些帮助穷人的项目操作中，政府的失败。尽管作者建议为效率更高的项目直接划拨资金（例如，提高透明度、更多妇女能够参与决策），但是他们也承认这种进步是渐进的。

总之，对于关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以及如何改善他们命运的人

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成果和对当前政策评论是非常重要的。通过重新配置现有资源，将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将得到丰厚的收益，但其中许多政策建议的合理性还有待于考察（尤其是，贷款分配和对保险、移民的补贴），同样还需要考虑折中方案、相对成本以及宏观

经济的影响等。

安妮·O. 克鲁格
(Anne O. Krueger)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
国际研究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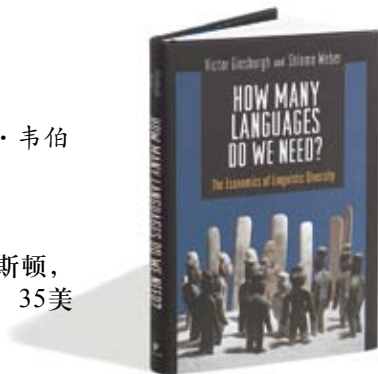
语言多样

维克特·金斯伯格、什莫洛·韦伯

我们需要多少种语言？

语言多元化经济学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新泽西州，2010年，232页，35美元（精装）。



在这个严谨的研究中，母语为斯瓦希里语的比利时经济学家维克特·金斯伯格和母语为俄语的加拿大籍博弈理论家什莫洛·韦伯，考察了目前全球正在使用的语言数量，评估了其成本和效益。

通常，我们认为减少语种能够提高效率。尽管没人知道现存语言的准确数量，但是这个数字大得惊人，理性估计约为6000—7000种。而世界一半人口的第一语言只是少数11种语言中的一种。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只有一种语言占主体，而那些语言多元化的国家，一般腐败和浪费现象较多。根据非营利性的美国国际语言暑期学院世界语言数据库报告，喀麦隆现在使用语言的数量是278种，乍得、尼日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使用语言的数量分别是131种、514种和830种。不难发现这种语言多样性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例如，会阻碍地理性的和社会性的流动，或者会限制许多公民享受主要的法律服务等。

很长一段时间中，乌托邦思

想家假想，将来有一天技术和政治规划能消除各文明间不同语言所存在的矛盾和困惑。现在，有人支持将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确，不少人认为英语已经是全球通用语言了。但是一种语言的统治优势会导致其他语言退化——这对世界语言和文化生态系统是潜在的灾难。金斯伯格和韦伯援引美国籍智利剧作家阿利埃尔·多尔夫曼的话，“英语地位的上升，正如许多其他与全球化相关联的现象一样，留下了太多看不见的失败者和失语者”。

金斯伯格和韦伯通常以极为专业的风格写作，在分支距离、民族语言分化以及不同的权利剥夺指数这些方面非常严谨。这个分析非常清晰，其中包括精心选择的许多来自诸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阿玛蒂亚·森等评论家的摘要片断。分析不仅讨论了翻译的成本，还讨论了约瑟夫·格林伯格试图对语言多元化进行量化，以及芬兰私营投资者的奇事和欧洲歌唱大赛等。

这本书最发人深思的部分是最后一章，它以案例分析的方式阐述了欧盟内部的语言政策。正是在

这章，金斯伯格和韦伯最为清晰地分析了实例，并最接近他们所提出的根本问题的答案：我们到底需要多少种语言？

每年，欧盟在笔译和口译方面要花费十亿多欧元，从事这两项工作的员工占欧盟委员会员工总数的1/10。随着欧盟继续扩大其成员国数量，这方面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如果语言方面需要妥协，一般会倾向于选择英语。但是有趣的是，这种环境下，母语为英语且只会说英语的人可能是不行的，因为他们不能确认非英语母语人的不同语言需求（例如，少数俗语和古代成语）。

金斯伯格和韦伯说，要同时保持政策有效性和尊重文化传统两方面的平衡很不容易。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建议欧盟合理的做法是采用六种工作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波兰语。

欧盟语言工作的改革需要合作，这就涉及了此书所探讨的根本问题：书名中的“我们”到底是指谁。这是一个表示集合的代词，是对集体的诉求。但它引发了对团结、凝聚力以及优先权等各种不同的定义。在任何有关语言（或政治）的讨论中，对于“我们”这个词都很难界定，正如此书的情况。

亨利·希金斯
(Henry Hitchings)

《语言的战争》等书作者

适者不败

得益于他在《金融时报》的专栏、BBC的广播节目“或多或少”，以及之前出版的图书，提姆·哈福德理所当然地拥有成千上万的粉丝。《适应》无疑会给他带来更多的仰慕者。这是一本阅读起来很令人愉悦的、介绍有关从生物学借用来的、应用于全球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模型的指南，书中有许多以作者独具特色的纯熟和风格描绘的、有趣的例子。

这本书关于适应的观点通过变异、选择和网络理论的角色等方面借用了进化论。本书指出存在正式的演化经济学模式，而其关于商业就是一种生存斗争的观点则更为直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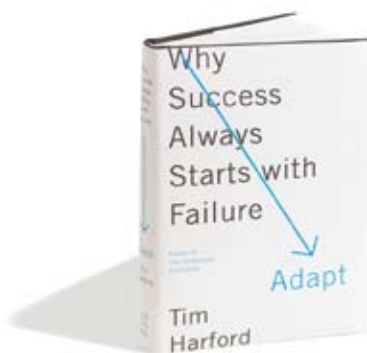
在经济和商业领域里，进化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如果人类的社会行为被证明与生命的基本法则密切联系，这也不会让我感到惊讶。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条令人激动的研究之路。

哈福德的贡献在于以范围广泛的例子解释变异、适应以及选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强调允许一些小的挫折，以此避免因为集中决策而导致的灾难性失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书中所举例子的范围很广，从军事领域（美军在伊拉克所采用的战术）到商业领域（莫哈韦沙漠有关太空旅行的生意），以及生物技术产业。比如说，待在总部的指挥官因缺乏地面情况的信息而难以制定有效的战术，在伊拉克获取胜利，但当地的指挥官却可以使战术适应特定的情况。

他还讨论了实验在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开发领域。哈福德提倡一种实验研究的方法，他主张这种方法可以给研究者提供细节信息；此外，还能逐渐使其谦虚地看待问题，以明白什么失败了、什么获得了成功。

哈福德所有例子的关键因素在于利用广泛分散的信息：“复杂的世界中充满了知识，局限一隅、转瞬即逝。”众所周知，与市场经济的成功相比，中央计划的失败就在于它无法掌握所有相关信息。环境越是复杂，就越是需要分散的决策。

考虑到任何市场中处于统治性地位的企业和公司的高级主管们对



提姆·哈福德

适应

为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

法勒、施特劳斯和吉劳克斯出版公司，纽约，320页，27.00美元（精装）。

于集中权力的明显偏好，需要时常重上这一课。实验以及小的失败的重要性正是竞争政策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作为英国竞争委员会的前成员，我将很高兴作者能够清晰地指出这一点。实验以及小的失败带来变异，以及允许异议的管理结构。

哈福德毫不抑制他对不受限制的创新的热爱，他指出创新越来越多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有效的组织。众所周知，Facebook始于哈佛大学的一间宿舍，几乎没有什么资金支持，哈福德争辩说它是一个例外。更常见的情况是，无论是一种新的药物或是电子游戏，可能带来专利的发明需要一支庞大的研究团队和大量投资。他指出，这使得平行创新过于昂贵，因为其中许多注定是要失败的。在许多情形中确

实如此，但是《适应》中的例子刻画的是高密度产业的特点，在这些产业中，无论创新的“成本”牵涉的是规则还是租金，都是一道准入门槛，而这又有利于在位企业（另外一本最近出版的书，吴修铭（Tim Wu）的《大变迁：信息帝国的兴衰》（*The Master Switch*），提供了一些很好的例子，表明占优势的企业排挤竞争者，导致“浪费的”平行创新的成果丧失）。

在最后的部份，《适应》转而关注网络模型、灾难（核泄漏、钻井平台爆炸）的蔓延以及银行业。这也是经济学家应用自然科学模型的领域，比如说，考虑一下传染病或者人口动态。正如“商业生态学”这个流行术语所反映的，这些模型直观上看起来也很适于解释一些经济现象。金融危机就是这种模型的一个明显选择。英格兰银行的金融稳定执行理事安德鲁·霍尔丹和生态学家、前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罗伯特·梅爵士，已经一起研究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缺陷（《自然》2001年1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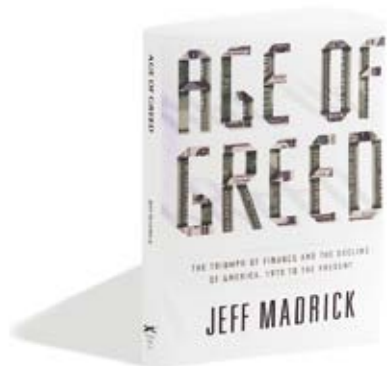
最后一章“适应与你”令人失望。毫无疑问，这一章是应出版者的要求而撰写的：这种朴素的建议可能有利于书的销售。我更希望看到“适应与公共政策”这样的章节，因为这本书只是在开发实验的背景中触及到政策层面的内容。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抱怨。

这本书用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使它带来的新奇的（对经济学而言）模型闪闪发亮，这是一份真正的礼物。哈福德拥有一些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诀窍，能把复杂的东西变得不仅简单明确而且自然而然。《适应》是一本很棒的书。

戴安娜·科伊尔
(Diane Coyle)

《知足经济学：经济如何运行才能有利于未来》的作者、启蒙经济学咨询公司的主管

宇宙的主宰



杰夫·马德里克

贪婪的时代

1970年至今以来，金融的胜利和美国的衰退

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出版社，纽约，2011年，496页，30美元（精装）。

杰夫·马德里克，美国最富活力与娱乐性的通俗经济学作家之一，用他文采横溢的描写再现了过去40多年一批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人物，其中包括李世同、米尔顿·弗里德曼、理查德·尼克松、艾伦·格林斯潘、保罗·沃尔克、乔治·索罗斯以及安吉罗·莫兹罗等。读者会发现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美国的思想与实践在不负责地倾向于对金融的膜拜，而越来越少的人认为联邦政府是我们的朋友。即便如此，该书的每个章节仍是自成一体的。

关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一章是我最感兴趣的。一方面因为我是个经济学家，另一方面因为还没有关于他的较重量级的传记。从好的方面来说，这一章十分吸引人，马德里克极富说服力地把弗里德曼描述成一个政治企业家。我如饥似渴地读完这一章，可谓达到了阅读的终极目标：希望他能写得更长些就好了。

这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我发现当中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这一章名为“米尔顿·弗里德曼，

改变宗教信仰者”，其中有很多关于弗里德曼早年是怎样一个“狂热而虔诚”的犹太人的内容。给人的印象是，此人是一个聪明但不负责任的简单思维者和教条主义者。而对于其如何坚持进行很棒的实验工作，验证了许多经济学观点的可伪证性，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日后培养出大批一流学者和未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院，曾多次改变自己对于经济问题（包括对于货币理论和政策）的看法等等这些方面，作者都没有给予与前相当的论述。与本书所呈现的形象相比，弗里德曼绝对是一个科学家和怀疑论者。

书中还有些不寻常的错误和疏漏。在谈到弗里德曼有意缩减某些社会项目时，作者没有提到他是想以稳定的年收入来替换。而作者声称“流通周期的不规律是最终导致19世纪80年代终结了货币主义的原因”，这显然是错误的，当时急剧波动的利率是更大的问题，像瑞士这类开放的经济体都出现了

读者会发现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美国的思想与实践在不负责地倾向于对金融的膜拜。

汇率方面的问题（货币流通的确有些异常，但这种变化十分缓慢）。马德里克认为，“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已知的经济学做出的贡献不大”，或是他们所著的《货币史》基本没有实证基础，这一观点恐怕也不会得到几个经济学家的赞同。与之相反，现在被广泛承认的观点是，通货膨胀——至少正在出现的通货膨胀——正如弗里德曼指明的，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这些谬误不仅仅是简单的不小心的疏忽，它系统性地降低了弗里德曼留下的学术遗产的深度和影响力。

这本书也没有提到这样一个事

实，即在其提及的大部分时间段，整个世界形势是许多超级大国实际上是被控制在一种中央统治经济的意识形态之下，比如前苏联和中国，这种情况较温和的模式则差点毁掉了英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作者提到的许多经济人物，尤其是较早早期的几位，如果不把他们的言行放在这个广阔背景下展现，就很难被人所理解。

书中最不吸引人的几篇是关于那几个最著名的人物的。仅仅几页纸的篇幅就能让我们对吉米·卡特、理查德·尼克松或者艾伦·格林斯潘了解更多吗？而将泰德·特纳、萨姆·沃尔顿和史蒂夫·罗斯合到一个章节，对这三位中的任何一位谈得上公平吗？

这本书素材的来源使我感到迷惑。许多章节完全建立在为人熟知的二手材料上。为什么作者不将重点放在他采访过的几个人物身上，或者要不然做些第一手的研究工作呢？然而，要把此书贴上离经叛道的挑战传统思维的标签，又远远缺乏论据。该书的主题和倾向联结不够紧密，使之不能成为对整个时代理解的有用的材料或者概括，其中的篇章完全可以单独发表。

无可否认，马德里克认为金融业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沉沦是件悲哀的事这一观点，我感同身受。但我觉得，他要是用几个简单的事实来做引导，就会好得多。这些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它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收入可以衡量。）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趋势背后有哪些更广阔的、超出个人力量的因素？为什么政客们那么喜欢与金融为伍，而不是惧怕它？要是附加一个简单的故事来说明，书中所述每个人物的重要性会清晰得多。总而言之，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不乏有趣之处，但是没有明确的意义。

泰勒·科文

(Tyler Cowen)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